

赤道人忆旧

父亲坎坷的一生（二）



西加里曼丹盛产优质木材，坤甸是木材集散地，大批原木从林区沿卡布亚斯河（卡江）漂流运至坤甸，然后加工成木材出口到世界各地，因此西加里曼丹的木材也叫“坤甸木”。图为停泊在坤甸卡江木材码头的原木“杉排”

直到当年8月17日，印尼共和国政府庆祝独立一周年，由总统颁布特赦令，赦免那些查无实据的“嫌疑犯”，父亲一行人才恢复自由。之后，荷兰政府派船到公海接回这些被赦免的人回巴城（雅加达）。父亲此时已一无所有，幸好碰到一位好心的老同学，出资租了一艘机帆船，要父亲去新加坡做一趟买卖。父亲满怀信心地押着一批货物到新加坡。他命中注定没有发财的缘分。夜间，船到新加坡港口，停泊在内海等待天明进港的信号，没想到深夜轮机舱突然起火，父亲和船员弃船逃生泅水上岸。幸好他在新加坡有不少熟人，由一位老朋友资助买了一张船票，才平安回到坤甸。

父亲为人乐观，性格开朗豁达，他并不因屡遭挫折而心灰意冷。他待人诚恳，忠厚老实，讲仁义守信用，平时也乐于助人，信誉佳，人缘好，每当他身陷逆境

时，总有人向他伸出相助之手。他遭难回来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做藤席生意的同乡潘赐宝上门找他，说：“我做的是小生理，赚钱不多，但只要我有口饭吃，就不会饿着你一家人！”潘赐宝的妻子郭氏是潮州庵埠郭陇人，和我母亲是同乡，幼年时俩人曾结为金兰姐妹，我们叫她“郭陇姨”，循例叫潘赐宝为“赐宝丈”。“赐宝丈”做的是小本生意，没开店铺，只在住家门口挂着块招牌——“潘赐宝经营马辰席”（马辰为南加里曼丹首府，当地产的顶级藤席叫“马辰席”）。“赐宝丈”识字不多，又不会讲印尼话，父亲便成了他的好帮手。直到1951年以后，父亲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每晚还要到他家里帮他结账和处理信函。父亲和“赐宝丈”情同手足。1956年，当父亲决意回国时，“赐宝丈”几次到我们家里，双眼泪汪汪地恳

求父亲留下，依依不舍之情难于言表。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我和大哥相继回国，父亲也时来运转，经朋友的介绍，在经营坤甸木的“森丰木材公司”任职。由于父亲为人诚实厚道，二战前又在木材厂工作过，有经营木材的经验，深得朱老板的赏识和信任，获得较优厚的薪酬。1953年，朱老板预支一笔钱，帮父亲用当地木材——坤甸木建了一套三居室的木屋，我们家才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家里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母亲晚年对我说，她和父亲结婚几十年，那几年是家里生活最好、最有安全感的时日。但几年后，父亲却不顾亲友的劝阻，义无反顾地决定举家回国定居。

父亲为什么要放弃舒适安定的生活而回国，究其原因是一、落叶归根的思想。那个年代的华侨不把侨居国当为自己的家园，而是谋生的地方，一旦在海外有些积蓄，便千方百计把子女送回国读书，自己随后也回乡定居。二、印尼独立后掀起了排华反华浪潮，对华人经商活动、居住生活等作了很多限制，华侨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印尼已不再是华人安居的乐土。三、新中国的成立，特别

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国内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一个强大、繁荣昌盛的祖国对海外华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父亲爱我们这个国家。四、早期回国的子女都有了工作或在读大学，特别是大哥和我、三弟都在地方或部队工作。他回国定居，即使没找到工作，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因此，父亲在1956年夏毅然决然举家回国定居，实现了他落叶归根夙愿。

父亲举家大小8人回到广州后，暂住于东山区龟岗省人民银行职工宿舍。他已年过半百，又无一技之长，在广州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便申请去广州郊区黄陂华侨农场定居。这个农场是广东省侨务委员会牵头，由13户印尼归侨集资创办的，初期拥有200亩地和几头耕牛、农具。父亲和先期回国的大伯父在农场建了一套土坯砖木结构的联体木屋，每家约120平方米。当年

秋后搬入农场居住。此前，五弟勇聪已赴北京读高中，二妹佩珍、六弟绍聪、三妹绍珍也在广州华侨小学读书，都是住校生。随父母到华侨农场居住的是刚满三岁的四妹瑛珍和一岁半的小妹坤珍。

黄陂华侨农场离广州市区十余公里，位于广汕公路边，交通方便。初创时，省侨委会派来一位科级干部协助创业。这十几户归侨在印尼都没种过水田。初始，农场以种植菠萝、香蕉、荔枝、橙子等为主，劳动强度不是很大。父亲在印尼虽未从事过农业劳动，但到广州近郊的农场定居，是当时很多经济实力不强的归侨的理想选项。父亲到农场后来信对我说，国内的生活虽比印尼艰苦，但平静安定，他现在“日出而耕，日落而息”，无忧无虑，不似在印尼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的环境中。他认为回国这条路是走对的。



马来人（也称巫来由人），是西加里曼丹的土著民族，多住在沿海地区，从事农渔业生产。图为20世纪50年代坤甸卡江沿岸马来人的水上甘榜（水上乡村）。